

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

金石文献展



王帅在当天活动上致辞

「王懿荣与晚清金石文化」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

在朋友圈里，读懂接地气的王懿荣

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

甲骨文发现第一人与晚清爱国先驱之外，朋友圈里的王懿荣，到底长什么模样？

4月28日，“王懿荣与晚清金石文化”学术研讨会在王懿荣纪念馆举办，来自复旦大学、浙江省文物鉴定站、西安碑林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和浙江大学的多位国内金石学者齐聚一堂，将王懿荣朋友圈的诸多轶事、趣事娓娓道来。

“穷归穷，天下只有古董一门有味”“小篆喜联写好没有？火烧眉毛了”“这件石刻，肯定是三国时期的”……一封封信札，恰如一条条朋友圈动态，将王懿荣与潘祖荫、张之洞、吴大澂、端方等人的交往逐一呈现。朋友圈里的王懿荣，固然有着考据广博、治学严谨的一面，也有痴迷石碑版、生计穷困潦倒的另一面，更有根据拜访者不同学问发名片、奔驰千里一睹真迹的真性情。

一人千面，这才是更真实、更鲜活、更接地气的王懿荣。



王帅：
更鲜活的王懿荣，更可以共情

人物名片：芸廷文化发起人、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、鲁东大学教授。

我们做的这个展览为什么叫“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”？大家知道王懿荣身上有两个熟悉的标签，一个是甲骨文发现第一人，一个是著名的爱国先驱，这两个标签让人肃然起敬，却也有些高不可攀，甚至有点敬畏。一个人的人生，不可能只有两个标签，人是丰富的，标签之外是细腻的情感。

王懿荣在求学、为官之路中

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尤其是面临重大人生选择时的内心挣扎，以及他一直奉行的价值观和学术观念，都在他日常信札中有所展现。我们希望通过展览，重现他日常生活的场景，让王懿荣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，这也是我们做展览的初心。这次展览没有特别宏大的主题，而是基于回到王懿荣本身，让他在大家的眼前更加鲜活生动，更可以共情。



陈根远：
见证博物馆与民间收藏双向奔赴

人物名片：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。主要从事玺印、瓦当、碑帖、铜镜等文物艺术研究与鉴定。

王懿荣与西安碑林，有着悠远而深厚的缘分。王懿荣于1878年2月开始出发进川探亲，途中路过陕西文庙长安学宫，特意去读《唐开成石经》。先贤的足迹不但留在了西安碑林，对碑帖的痴迷更见于题跋之中。

研究晚清金石学，金石名家的书札是绕不开的内容。近年来，民间收藏持续兴起，通过信札往来，一个更鲜活、更生动的王懿荣跃然纸上。横跨官场、学界与市井的书信往来，呈现了当时金石学界对王懿荣学术水准

的高度评价，用一句当代的话讲——“这方面，王懿荣是专家！”

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说过：“博物馆要和民间收藏家做朋友。”但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乐意接纳民间藏品，更不要说以民间收藏为主体设计展览。“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”不但是福山士子对家乡的拳拳深情，更是公立博物馆对民间收藏家的致敬。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不若与人”，无论展品来自哪里，都是民族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

周永良：
两位甲骨文巨匠神似的科举路

人物名片：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，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。从事文物管理及鉴定工作四十余年，主要研究鉴定明清及近现代书画。

在温州瑞安玉海楼内，有一幅王懿荣给孙诒让题写的匾额“百晋陶斋”，这件文物正是两位甲骨文巨匠人生交集的见证。

孙诒让生于道光二十八年，较王懿荣小3岁，两人因科考而结识。孙诒让在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考中秀才，同治六年乡试中举，这一年浙江乡试副考官就是张之洞（后来成为王懿荣妹夫），张之洞也成为孙诒让的座师。

王懿荣科举之路格外坎坷，孙诒让也曾屡试不第，八次进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，前后历时26年之久；同期的王懿荣也曾七次乡试，直到光绪五年中举（1879年，时年35岁），

光绪六年又接连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后来的科举道路倒很顺。两人首次结识应该在同治十年辛未（1871）春五月一日，潘祖荫在龙树寺设宴雅集，邀请了胡澍、赵之谦、王懿荣、孙诒让、张之洞等十六人，由此两人订交。

虽然“互加好友”，但此后两人交往不太密切，王懿荣长居北京，而孙诒让每隔四年才能到北京参加会试，见面机会不多。光绪九年癸未（1883年）春，孙诒让又一次北上参加会试，此时王懿荣正好授翰林院编修，任国史馆协修。五月孙诒让南归之前，王懿荣为他题写隶书匾额——“百晋陶斋”，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。



陈麦青：
他是博雅精到的“考古全能选手”

人物名片：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，长期致力于版本目录、金石碑帖及古代书画研究，著有《祝允明年谱》《随兴居谈艺》《书物风雅》等。

王懿荣留下的题跋文字和往还信札，不仅可见博雅精到的学识眼光，还能洞悉他当年以此游走于师友同好间的情状细节。他在书画、金石、信札、古籍和拓本都眼光独具、颇有心得。

譬如书法家赵孟頫的代表作《妙严寺记》，晚明文人文何良俊评价这幅楷书典范，认为赵孟頫书法墨迹比刻石更具神韵。300多年后，王懿荣在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书《帝师胆巴碑》墨迹卷的题跋中，支持了这一观点，并一直影响后世。

罗福颐《秦汉南北朝官印徵

存》中所收的三国“孙吴官印”，此前一直被认定为后赵官印，但王懿荣却敏锐地发现官印上“巧工”的写法，与后赵通行字体显著不同，进一步考证这枚官印实则来自三国时代，足见其治学严谨。

更令人动容的，是王懿荣在藏东魏《刘懿墓志》初拓本上的题跋，这次题跋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的阴历五月，而阴历七月就发生了庚子国变，王懿荣携妻、媳投奔殉国，在人生最后的时光仍致力于学术钻研，足见其文人本色。



秦明：
“五千里路三个月”背后的金石痴心

人物名片：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。长期从事碑帖文物的保管、陈列、研究工作。主持、参与多项故宫及外埠碑帖书画专题特展，参与多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。

我们常说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但王懿荣的拓碑之旅，却是货真价实的“五千里路三个月”。从京师到地方，往返上千里，耗时甚巨，风餐露宿，但王懿荣却对这样的“学术苦旅”乐此不疲。

故宫博物院目前所藏的十余件经王懿荣鉴藏的碑帖善本，90%是二级和一级文物，题跋、题签与钤印亦兼具文献与艺术价值，是晚清金石鉴藏的典型样本。

王懿荣一生的活动主要在山

东和京师之间，有限的三次外出中，一次是1893年7月任河南乡试主考官，其他两次都是到四川省亲。不管走到哪里，除了正常工作，访友和探寻古物是他的主要目的。故宫博物院藏有王懿荣的四帧《访碑图》，是他外出访古的有力证据，也是“汉隶—唐楷”、“祭祀—经典—吏治”的金石学标本，是“始祖信仰—儒家经典—汉代循吏”的中华文明主线，共同承载了晚清“尊经复古、守节存粹”的精神内核。



温安俊：
碎片化“朋友圈”的王懿荣更接地气

人物名片：浙江大学、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联培博士生。在《中国书法》《书法研究》《中国书画研究集刊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期刊、报纸发表多篇文章。

去年年末，“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”展览正式筹备，历时4个多月后终于开幕。如何从信札中窥见“王懿荣的朋友圈”？我们希望从他的交游网络中，让观众看到更多关于晚清知识生成的历史细节。总之，就是讲好王懿荣朋友圈的故事。

通过整理信札和相关文献，金石和科举贯穿了王懿荣的学术生涯。“穷”“病”和“好古”也是信札中多次提及的关键词。王懿荣身陷“官日崇而贫日甚”的矛盾境遇，这与我们传统认知中“升官发财”的逻辑相悖。他一方面痴迷金石碑版，装潢精雅考究，此为“阔相”，但他本人的生计却很潦

倒，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；另一方面，他嗜古成“病”，而这种“病”恰因世人普遍没有此癖好，反而让他获得了“疗愈”。最终，一个仕途上清廉、学术上好古的人设，被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
在王懿荣繁重的笔墨应酬中，我们还发现了一桩趣事——王懿荣的小篆代笔。他用不同字体的名刺（相当于现在的名片）应对不同文化水平的拜访者：有学问的拜访者，王懿荣会发小篆名片；稍有学问的，发隶书名片；完全没有学问的，则发楷书名片。为应对繁重的笔墨应酬，王懿荣和王瓘合作的篆书作品风格稳定、流传量大，进而成了后世评价王懿荣篆书作品的标准件。

